“好心茂名”文化赋能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茂名实践

刘楚欣 陈小霞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浪潮中,“好心茂名”文化作为茂名地区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滋养与精神能量,将其系统融入当地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学实践,不仅为思政教育注入了深厚的本土文化活力,更有助于打破学段壁垒,构建起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育人体系。从潘茂名“救人须用心”的精神传承,到荔枝产业链中蕴含的诚信基因,从木偶戏非遗进课堂到乡村振兴创客实践,茂名的探索不仅实现了地方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更形成了一条具有示范意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特色路径。

第一,推动文化认同与育人价值的深度融合。在多元文化交织的当代社会,培育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念与深厚的文化认同尤为重要。“好心茂名”文化以“唯用一好心”为核心精神,其所蕴含的爱国、友善、敬业、奉献等价值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在思政课教学中发挥了重要的价值引领作用。茂名市通过系统梳理冼夫人精神、荔枝文化、民俗传统等本土资源,将抽象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文化符号。例如,电白区中小学开设“好心故事会”系列课程,通过讲述冼夫人保境安民、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故事,让小学生在情境体验中感悟家国情怀。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则组织大学生开展“荔枝产业链中的诚信机制”主题调研,引导大学生从经济视角解读传统美德的现代价值,更进一步培育当代新生青年力量的“好心”价值。这种从感性认知、理性思辨到实践践行的梯度化设计,形成了全方位、深层次的协同育人格局,不仅增强了学生对乡土文化的认同与自信,更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扎根于地域文化的厚土之中,实现了文化育人功能的最大化,也是“好心茂名”文化认同与育人价值的深度融合。

第二,实现理论构建与课程设计的系统创新。“好心茂名”文化有机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为思政教育的理论研究与课程创新提供了新视角。茂名教育系统以《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为指引,积极构建“认知—情感—实践”三维一体的理论框架:在认知层面,注重文化情境的沉浸式学习,帮助学生理解“好心”精神的历史脉络;在情感层面,开发“好心精神体验课程”,增强学生的情感共鸣与文化归属;在实践层面,搭建“校社协同育人平台”,鼓励学生在真实场景中践行“好心”理念。课程设计上,茂名建立起纵向衔接、横向贯通的一体化体系。小学阶段开展“文化探秘卡”系列研学活动,打卡“好心”地,感受“好心”情,引导学生走进“好心”地标,在体验中感知文化;中学阶段设置“好心文化与社会治理”议题式课程,了解“好心”事,学习“好心”课,开展探究性学习,推动价值内化;大学阶段则推出“文化IP孵化”项目制学习,深化“好心”题,成为“好心”人,引导学生开展创造性转化与传播实践。各学段课程内容层层递进、逻辑连贯,体现了思政教育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内在规律。

第三,促进实践路径与资源整合的立体突破。茂名在推动“好心文化”育人实践中,形成了“全域联动、虚实结合、红绿蓝交织”的立体化实践格局。依托化州革命纪念馆等红色资源、浮山岭生态区等绿色基地、博贺渔港等蓝色经济平台,构建起覆盖不同学段、形式多样的实践教学体系。小学生可参与“好心志愿者”社区服务,中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开展“文化基因解码”田野调查,大学生则可主导“乡村振兴创客营”等项目,实现“做中学、学中悟”。资源整合方面,茂名着力推进“高校+中小学”结对共建机制。广东石油化工学院作为“广东省冼夫人文化研究基地”,持续开展本土文化学术研究与教学资源开发。该校马克思主义学院与茂名市“柏桥讲堂”、潘茂名纪念公园、广东南路革命化州教育基地、冼夫人故里文化等10个文化场馆签约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为一体化教学提供了稳定的平台支撑。由高校师范生主导开发的“好心文化”主题剧本杀等活动,也有效增强了思政课的吸引力与感染力。

第四,构建模式迭代与长效机制的双重保障。经过多年探索,茂名逐步形成了“课内课外双循环、教学评一体化”的育人模式。在“内循环”层面,打造“主课堂+实践基地+云平台”三位一体教学场域,由思政教师与文化专家组成“双导师”团队,形成“理论讲授–文化体验–项目创作”的教学闭环;“外循环”层面,积极构建“家庭—学校—社区—社会”协同育人网络,在社区设立“好心文化实践站”,家庭开展“好心家书共读”活动,引入企业实践岗位等方式,拓展育人空间。评价体系上,探索推行“文化素养积分制”,将学生参与非遗传承、志愿服务、文化创作等纳入综合素质评价,形成有效激励。

当前,“好心茂名”文化与思政教育的融合已超越单一的教学方法创新,正发展为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系统性教育变革。面对数字化趋势,茂名正积极探索“文化元宇宙”建设,拟将10处文化地标转化为沉浸式学习空间,并开发AI文化导师系统。推动本地文化地标向沉浸式学习空间转化,并谋划开发智能文化助学系统,进一步提升育人效能。这一根植地域、贯通学段、联动社会的思政教育创新实践,不仅为破解思政课“知行脱节”难题提供了区域样本,也为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贡献了富有生命力的“茂名经验”。这场始于课堂、源于文化的育人实践,正悄然重塑一座城市的教育气质,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本文系茂名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研究项目“‘好心茂名’文化融入茂名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学研究”(mjy2023152)、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德育专项)“AI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思、行、评’精准德育的实践研究”(2024JKDY035)、广东省本科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建设项目“AI赋能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创新与改革实践”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广东石油化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知识摆摊:多维解读、现实挑战与未来展望

刘晏熹

近年来,“内卷”带来的竞争压力与“躺平”折射的价值迷茫,成为当代青年群体的重要精神议题,高等教育大众化与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的叠加,推动部分青年探索传统职业路径之外的价值实现方式。在此背景下,“知识摆摊”现象悄然兴起:法学专业学生在街头提供法律咨询,心理学毕业生摆摊开展情感疏导,文学爱好者以“故事换诗歌”搭建交流平台,这类将专业知识、个人经验转化为“摆摊商品”的实践,借助社交媒体传播引发广泛关注。

当前知识传播领域,线上知识付费平台已形成成熟商业模式,但“知识摆摊”以线下化、非标准化、低门槛的特质形成差异化竞争。在数字化知识传播主导的当下,“知识摆摊”为何能吸引青年参与并引发社会讨论?其看似小众的实践背后,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心态变迁?深入解读这一现象的内涵、剖析其发展困境并探索未来路径,对理解当代社会知识流通模式变革与青年发展趋势具有重要价值。

一、“知识摆摊”现象的多维解读

(一)“知识摆摊”的概念界定

“知识摆摊”是以实体摊位为空间载体,以非标准化、互动性的知识、经验、技能为主要商品,进行低门槛交换(可能包含金钱、物品或故事交换)的社会实践,其核心特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草根性与去精英化,参与者多为普通青年,无需权威机构背书,打破了知识传播的阶层壁垒;二是场景的公共性与流动性,摊位设置于开放公共空间,顾客群体随机,互动场景具有不确定性;三是内容的个性化与实用性,服务内容围绕顾客即时需求展开,如简历修改、情绪疏导等,兼具个性化与实用价值;四是交换的象征性与社交性,交换形式不仅包括小额付费(多为10–50元),还包括物物交换、故事分享等,社交属性与情感联结超越单纯的商业交易。

(二)“知识摆摊”的实践样态

从实践样态来看,按内容划分,“知识摆摊”可分为专业咨询类(如法律常识解答、心理咨询、职业规划建议)、技能传授类(如快速记忆法教学、基础摄影技巧指导、手工制作教学)与文化交流类(如“诗歌换故事”“书籍漂流”“历史话题讨论”);按交换模式划分,则可分为付费型(如20元/次法律咨询)、置换型(如“一幅素描换一个人生故事”)、公益型(免费提供考研经验分享)三类,其中付费型占比最高,但金额普遍较低,更多体现“价值认可”而非商业盈利属性。

(三)“知识摆摊”与相关概念辨析

与相关概念相比,“知识摆摊”与传统地摊经济的核心差异在于“商品形态”——前者以无形知识为核心,价值衡量依赖主观体验,后者以实体物品为核心,价值相对标准化;与线上知识付费相比,其优势在于临场感与即时互动,摊主可通过表情、肢体语言捕捉顾客需求,即时调整交流内容,形成线上平台难以替代的情感联结;与公益法律服务、心理咨询相比,它更具灵活性与个人化色彩,无需严格遵循机构流程,互动氛围更轻松,降低了公众的求助心理门槛。

二、“知识摆摊”的争议焦点与现实挑战

(一)争议与局限:专业性、可持续性与形式化风险

“知识摆摊”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诸多争议与局限性,首先争议是专业性与伦理风险,部分摊主缺乏专业资质,如非心理学专业学生提供情感疏导,可能给出不当建议,法律咨询中,非执业律师提供的意见也可能存在法律风险;其次是可持续性难题,多数摊位依赖个人兴趣驱动,缺乏稳定的运营模式,易受天气、政策等外部因素影响,难以长期维持;此外,还存在形式化风险,部分摊主将“知识摆摊”作为社交媒体“打卡素材”,过度注重拍照宣传,忽视知识交流的本质,使实践沦为“行为艺术”。

(二)现实挑战:政策模糊与认知偏差

现实挑战方面,政策与管理的模糊地带是重要问题,目前“知识摆摊”的性质界定尚不清晰,城市管理方在规范引导与包容发展之间难以平衡,易出现“一刀切”管理现象;公众认知与接受度也有待提升,部分人仍持有“知识不应标价”或“摆摊即低端”的传统观念,对“知识摆摊”的价值缺乏认可,影响其发展空间。

三、“知识摆摊”的未来发展路径

(一)规范化发展:公共机构赋能与专业提升

推动“知识摆摊”与社区、图书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合作,一方面解决场地难题,获得固定且合规的经营空间,规避城市管理风险;另一方面借助机构的专业资源,邀请执业律师、心理咨询师、资深教师等专业人士对摊主进行培训,建立服务资质审核机制,提升服务专业性与规范性。同时,通过公共机构的官方背书,增强公众对“知识摆摊”的信任度,打破认知偏见。

(二)混合化运营:线上线下协同与效能优化

探索“线上预约+线下深度交流”的混合模式,通过微信小程序、社交媒体账号等线上平台,实现需求发布、摊位预约、话题预热等功能,帮助摊主提前了解顾客需求,提高服务针对性;线下则聚焦深度互动与体验,开展面对面交流、实操教学等活动,发挥线下场景的情感联结优势。这种模式既能突破线下场景的时空限制,又能弥补线上交流的临场感缺失,提升服务效率与稳定性。

(三)体系化建设:社会实践框架的嵌入与落地

将“知识摆摊”发展为高校社会实践或服务学习项目,纳入学分体系,引导学生将专业知识与社会需求对接,既为“知识摆摊”注入专业力量,也为青年提供了实践平台。同时,可建立行业自律组织,制定服务标准、收费参考、纠纷处理机制等行业规范,推动“知识摆摊”从自发无序的街头现象,转变为规范化、可持续的社会服务形式。

结语

“知识摆摊”作为线下知识流通的新形态,以其草根性、公共性、互动性的核心特质,为知识传播与青年发展提供了新可能。尽管当前面临专业性不足、可持续性薄弱、政策管理模糊等多重挑战,但其所蕴含的“开放、平等、互动”的知识传播理念,契合当代社会对知识民主化与公共空间活化的需求。未来,随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青年就业观念的转变及社会认知的提升,“知识摆摊”有望从“街头现象”发展为“社会服务常态”,为构建更开放、更具弹性的知识社会,以及充满活力的城市文化提供微小而重要的支撑。**(作者单位:广东石油化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深刻领会正确二战史观的三重逻辑

陈家毅 周黄琴

习近平总书记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总结会议中强调:“要坚持正确抗战史观、二战史观,坚定历史自信,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族众志成城英勇抗战的伟大胜利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面,把握历史主动,在以史为鉴中不断开创未来。”二战史观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根本性认知与态度。树立正确的二战史观,是关乎是非正义的重大原则问题。深刻领会二战史观的时代价值,关键在于把握其历史与理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这对于正本清源、开创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一、历史逻辑: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赢得二战胜利的关键因素

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具有历史必然性。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德、意、日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国家疯狂侵略扩张,不仅严重破坏国际秩序,更对全人类构成生存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国际社会逐步认清唯有团结协作方能应对共同威胁。1942年1月,《联合国家宣言》的签署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国家超越分歧,建立起广泛的国际同盟。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发展,不仅为最终击败法西斯奠定了坚实的政治与军事基础,也通过强调正义性、国际协作与集体安全深刻影响了二战史观的构建,并凸显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历史逻辑。中国作为东方主战场,以军民伤亡超过3500万的巨大牺牲,历经14年浴血抗战,始终承担着牵制日军陆军主力的战略任务,不仅有效挫败了日本的双向战略,更通过强大的战场吸附作用,有力促进了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战略重组。与此相应,美国对华援助从战争初期有限经济贷款转变为租借法案全方位援助。这一转变印证了中国战场的战略价值及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

这一历史经验表明,面对全球性挑战,各国应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努力。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国际社会共同奋斗的结果,而非一国一族的独享。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深刻的历史启示,也是应对现实挑战的必然选择。任何歪曲历史的行为,都是对历史真相与人类正义的公然背叛。

二、理论逻辑:战争胜利最深厚的根源在于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正确二战史观得以确立和发展的理论根基与方向指南。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深刻阐释:“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从广州保卫战“五百壮士”的殊死抵抗,到东江纵队的跨国营救,从欧洲民众保护犹太难民的义举,到世界范围内各国人民的相互援助,无不印证人民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发挥人民的历史作用,更需运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正是抗战时期减租减息、民主选举等生产关系变革,重塑了社会关系,才激发出“母亲送儿打东洋”的磅礴伟力。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无私奉献,雄辩地证明了真正的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归根到底是人民的胜利。

人民史观为理解历史发展提供了科学视角,坚持正确二战史观必须驳斥夸大单一因素、忽视人民力量的片面论述。应以唯物史观审视二战,将叙事中心从少数精英转向亿万民众,充分肯定各国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伟大贡献。忽视人民力量、过度强调个人或武器技术的史观,不仅缺乏理论依据,更易导致对历史的严重曲解。

三、实践逻辑:捍卫和平与发展是历史赋予当代的共同责任

厘清二战胜利的历史逻辑与人民伟力,旨在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在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正确的二战史观,其最终归宿必然在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伟大实践。二战的惨痛教训告诫世人,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防止战争重演、维护持久和平,乃是国际社会的共同使命。

将正确的二战史观付诸实践,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第一,坚决反对任何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行为。德国通过深刻反省赢得国际信任,推动欧洲和解;而日本部分势力仍坚持历史修正主义,不仅引发邻国担忧,也损害自身国际形象。这一对比表明,唯有直面历史、抵制军国主义复燃,才能维护正义与互信,避免悲剧重演。第二,维护并完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当前,联合国仍面临安理会改革困境及代表性不足等现实问题。正因如此,联合国会员国更应以正确的二战史观为指引,积极捍卫联合国权威,推动其适应21世纪全球治理的需求。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对二战史观和联合国精神的继承与发展。第三,弘扬伙伴精神,加强全球合作。各国要超越零和思维,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数字治理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在此进程中,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和全球发展倡议等实践,为推动共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坚持正确的二战史观,其核心便是以史为鉴,走和平发展道路,捍卫公平正义,共同建设和平、繁荣、公正的世界。这既是对历史与先烈的真正尊重,也是我们肩负的共同责任。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正确二战史观,坚定做历史记忆的守护者。”坚持正确的二战史观,是对历史的尊重,更关乎未来方向。新时代青年应自觉传承这份记忆,深刻理解二战中团结、牺牲与正义的价值,并认识到面对全球性挑战,没有国家能独善其身。青年须树立国际视野与人类情怀,抵制历史虚无主义,警惕战争风险,践行和平理念,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唯有从历史中汲取责任,才能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者、和平的捍卫者与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引领者。**(作者单位:广东石油化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00后”与乡土中国:从血缘根基到价值认同的深刻转型

黄世霖 唐少莲

当代社会结构的快速变动使得00后逐渐成为社会的主力军。在这一代人中,普遍存在着对传统人情往来的疏离以及对亲戚关系的淡化,这一现象引发了关于乡土中国终结的热议。然而,这并非传统乡土的消亡,而是其向现代社会深刻转型的必然阶段。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以血缘为核心,在互联网时代因社会规则的完善、个体意识的觉醒,已不再成为00后维系生活的依托。对无效社交的疏离,是时代进步与个体觉醒的体现,乡土中国追求归属感的本质从未改变,00后疏离传统亲戚往来,更看重真诚、平等、价值观契合的关系。这不是乡土的消失,而是旧秩序退场、新共同体的形成。

一、00后的疏离:人情淡化的理性选择

(一)社会流动性的提升与人情网络的解体

在传统乡土中国,血缘与人情是维系社会秩序的纽带,个体生存依赖于宗族与礼数。然而,00后成长于交通便捷、信息碎片化的时代,社会流动性大幅提升,多数人通过高考离开故土,在异乡求学就业,留守青年也因产业升级脱离传统农业生产。地理迁徙让血缘网络失去了空间依托,亲戚之间散落天南海北,物理距离的拉大必然导致心理疏远。更重要的是,00后通过教育与职业实现社会流动,不再依赖血缘解决就业、婚恋等问题,血缘失去功能性和不可替代性,传统人情网络的解体成为必然。

(二)经济独立性增强与人情成本的理性考量

传统乡土社会中的人情往来,表面是情感交流,实质是利益交换。“礼尚往来”背后是隐性资源互换,血缘亲疏与其社会地位挂钩。00后成长于市场经济相对成熟、金融体系日益完善的时代,获取经济支持的渠道多元化,无需通过人情网谋资源。经济独立让他们对人情往来的沉没成本敏感,拒绝人情的道德绑架。这种理性考量是对人际关系本质的重新审视,当人情往来成本高于情感价值收益,选择性疏离便成为自我保护,这也是现代社会人际关系从“强关系”向“弱关系”转变的微观体现。

(三)个人空间的尊重与心理健康的需求

00后对人情往来的疏离还深深根植于个体意识的觉醒与心理健康诉求的凸显。成长中接触的多元价值,让他们对“个人边界”“情绪价值”天然的敏感。他们拒绝形式化的家庭聚会,不接受“为你好”的道德绑架,屏蔽亲戚间的无效攀比,选择数字化疏离:以“点赞”替代“拜访”,用“表情包”表达“寒暄”。在00后看来,这是维护心理健康的必要方式,他们在重构人际交往伦理边界:尊重胜于亲密,真诚胜于客套,平等胜于尊卑。

二、乡土中国的深层逻辑:从“血缘”到“价值”的迁移

(一) 归属感的本质与共同体的当代形态

乡土中国的核心逻辑并非血缘本身,而是人们对归属感与共同体的内在需求。这种对归属感的内在需求是超越时代的,而满足这一需求的方式却是历史的、具体的。00后疏离了血缘关系网,却从未放弃对归属感的追求,只是寻求归属感的场域发生了转移。他们从宗族祠堂转向兴趣社群,从亲戚聚会转向朋友聚会,从地域同乡转向价值同盟。这些新型共同体的纽带不再是先赋的血缘,而是后天的价值认同。这种归属感因自愿而真诚,因选择而牢固。

(二)差序格局的扩展与重构

费孝通笔下尊卑有序的差序格局,在00后身上并未消失,而是实现拓展与重构。传统差序格局以血缘为唯一标准,亲属远近决定了权利义务的轻重,而00后的差序标准愈发多元、具体,求学时同学、导师比远房亲戚更核心,兴趣领域同好取代表亲堂亲,价值层面志同道合成为新“自家人”。这一重构将差序格局从封闭血缘圈层拓展到开放社会空间,划分标准从血缘远近转向价值观契合,准入机制从先天注定变为后天双向选择。这让个体从血缘决定论中解放,获得身份建构的主体性,也要求个体为选择负责,承担共同体建设义务。

(三)数字化技术的介入与新伦理的建构

00后构建的共同体具有鲜明数字化特征,微博超话、抖音话题、B站弹幕中,“虚拟血缘”正在形成,素不相识的人因为共同关注某个事件而凝聚在一起。传统人情往来被转化为数字化的社交互动,点赞代表问候,转发意味着认同,弹幕转化为陪伴。这种碎片化互动,弥补了物理空间流动带来的情感裂痕。这些新伦理重塑乡土中国的道德底色,从强调“亲不亲,一家人”的绝对义务转向强调“合则来,不合则去”的相对自由,从重视“长幼有序”的等级伦理转向重视“平等对话”的契约精神。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如何共处”这一永恒问题的全新回答。

三、转型的困境与未来的可能:在断裂与延续之间

(一)情感认同的割裂与文化记忆的断层

转型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00后面临着深刻的情感张力与文化困境。乡土意象被高楼取代,节日记忆被外卖、短视频覆盖,00后渐生文化失落感,春节“年味淡了”的讨论,背后是文化传承断层的集体焦虑。00后对传统节日的仪式感日益淡漠,难以理解父母辈对团圆的执着,这在长辈眼中是“忘本”,却是00后生活方式改变后的自然选择。但情感割裂仍带来困扰,许多00后享受个人空间的同时,因缺乏家族叙事、乡土记忆的支撑,陷入无根的漂泊感。

(二)价值观的迷茫与身份的危机

摆脱了血缘的决定论,00后获得了身份选择的自由,却也面临着价值迷失的风险。传统的伦理被解构,新的伦理体系尚未成熟,多元价值碰撞下,他们常常感到无所适从。他们渴望真诚平等的人际关系,现实却充满功利算计;追求自我实现,却被社会压力挤压选择空间;认同价值共同体,虚拟社群的流动性却让其难以持久。这种矛盾随处可见:他们反感亲戚过度关心,却渴望深夜陪伴;拒绝被传统人情绑架,却在孤独时怀念被理解的温暖。价值观的迷茫、身份的焦虑、归属感的缺失,是00个体的困惑,更是时代的文化命题。

(三)新型共同体的构建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尽管困境重重,00后与乡土中国的故事仍在续写,新型共同体的建构正沿多元路径展开。其一,乡土记忆数字化传承。VR、AR技术赋能数字祠堂、虚拟家谱、线上民俗博物馆,使00后便捷接触传承乡土文化。其二,传统节日当代转化。线上团圆、云端守岁、短视频拜年,为传统节日注入新活力。其三,价值社群的实体化。越来越多的00后“线上结缘、线下相聚”,让线上情感有线下真实连接。其四,乡土伦理创造性重构。传统“孝悌忠信”被赋予新内涵:孝是理解与尊重;悌是平等互助,忠是坚守共同价值;信是普遍化诚信伦理。

结语

00后是乡土中国的关键一代,他们告别传统血缘纽带,却坚守着乡土归属的核心追求,主动构建以价值为核心的新型共同体。这场从血缘根基到价值认同的转型,是乡土中国的全新发展。我们应以历史眼光看待这一变迁,与00后一同探索新时代的精神归宿,让乡土中国的内核在转型中延续、在创新中新生。**(作者单位:广东石油化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